**人工智能时代人与技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探究**

**摘要**：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深刻改变了人类社会，重新定义了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理论框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系统性分析了人工智能时代下人与技术关系的本质、特点及发展趋势。人工智能作为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推动人类全面发展的工具，也可能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加剧劳动者异化和社会不平等。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和结合实证案例，提出在社会主义框架下应通过民主化的技术治理、社会化分配机制和公众教育，确保人工智能技术服务于人类的自由与幸福，而非资本的逻辑。  
**关键词**：人工智能，马克思主义哲学，人与技术关系

**一、引言**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其在生产、生活、治理等领域的广泛应用深刻改变了人类社会的运行方式。从智能制造的工业机器人到医疗领域的疾病预测系统，从算法驱动的社交媒体到自动驾驶技术，人工智能不仅极大地提升了生产效率，还在重塑人与技术、人与社会的关系。然而，技术的进步并非单纯的中性工具，其背后蕴含着深刻的社会经济关系和意识形态内涵。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指出的，“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是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1]](#endnote-1)。人工智能作为一种高级生产力，其发展方向和作用效果深受社会生产关系的制约。

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其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框架，为分析人工智能时代下人与技术关系的本质提供了科学的视角。技术作为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始终嵌入于特定的社会关系之中，而在人工智能时代，技术的“双重性”——既是解放人类的工具，又可能成为异化人类的手段——表现得尤为突出。本文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探讨了人工智能时代下人与技术关系的动态演变，揭示了人工智能技术在不同社会制度下的作用机制，并结合了具体案例和数据，提出在社会主义框架下实现技术解放的路径，最终回答了在人工智能时代，该如何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和技术治理，确保技术服务于人类的全面发展，而非加剧社会不平等与异化。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哲学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核心，强调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以及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根本原理。技术作为“物化劳动”的体现，是人类改造自然、实现自身发展的工具，但其发展并非孤立，而是与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紧密互动。

在人工智能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关键的理论工具，用于分析技术进步对社会关系的影响及其在不同制度下的作用机制。

首先，人工智能作为一种高级生产力，重塑了劳动方式与社会分工，其效果因生产关系的性质而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进步常被资本用于增殖，加剧剥削与不平等，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通过社会化分配，技术可服务于全体人民的福祉，促进公平与发展。其次，异化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劳动过程、自身本质及他人的疏离现象，而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可能加剧这一异化，使技术从服务人类的工具转变为支配人的力量。最后，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类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主体性，认为技术应助力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而非反过来控制人。人工智能的“类主体性”特性挑战了人的主体地位，引发了技术伦理与治理的新问题。

**三、人工智能时代下的人与技术关系分析**

**3.1 劳动与技术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将劳动视为人类存在的根本，技术则是劳动的延伸与升华。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进一步推动了生产力的跃升，尤其在自动化、数据分析和智能决策领域。即使是创意艺术这一被认为人类特有的领域，人工智能的应用也在激增，从电脑创作新音乐到绘画程序复制伦勃朗风格的图片。所有这些应用程序的共同点是，涉及的任务被认为需要拥有与视觉感知、语音、情感识别和决策相关等特定的人类能力。换句话说，人工智能正在取代脑力劳动，而不是像以前的机械化浪潮那样取代体力劳动[[2]](#endnote-2)。

然而AI技术的广泛应用也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引发了劳动结构的深刻变革。AI技术推动了劳动的极化和去技能化，高技能岗位需求激增，这也导致低技能劳动者面临失业风险。作为劳动力市场的参与主体，劳动者如何适应技术进步、积累自身人力资本以应对新的工作技能需求，是人工智能时代的重要议题[[3]](#endnote-3)。

在社会主义框架下，AI技术可通过合理的资源分配和教育改革，转化为解放劳动者的工具，此外，缩短工作时间、实施全民基本收入等政策可将AI的生产力红利转化为社会福祉。西班牙2021年试点UBI项目，部分资金来源于自动化企业的税收，旨在缓解技术进步带来的就业压力，从而为劳动者从事创造性活动和自我实现创造条件。

**3.2 异化与解放的关系**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异化理论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劳动过程、自身本质及他人发生异化[[4]](#endnote-4)。而在“零工经济”中，算法驱动的劳动管理尤为显著。亚马逊仓库的智能监控系统通过算法实时追踪工人操作效率，对未达标者自动发出警告甚至解雇通知，使劳动者完全丧失对劳动过程的控制。这种“技术异化”不仅体现在劳动者与劳动过程的分离，还表现为人际关系的物化。社交媒体平台的算法推荐系统通过精准操控用户行为，强化了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使人际交往日益被商业逻辑主导。

此外，由于深度学习算法的复杂性和不透明性，普通用户难以理解技术决策的逻辑，导致人在面对技术时产生无力感和疏离感。例如智能招聘系统因算法偏见导致女性求职者在科技行业的录用率低于男性，但求职者无法获知拒绝的具体原因，这进一步削弱了人的主体性。

AI通过减少必要劳动时间，为人类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但其解放潜力的实现高度依赖社会制度。在资本主义框架下，AI收益往往被资本家占有，2022年谷歌母公司Alphabet的AI业务利润占其总收入的40%以上，而普通劳动者难以分享技术红利。在社会主义框架下，通过社会化的分配机制，AI的成果可更公平地惠及全体社会成员。

**3.3 主体性与客体性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人类是历史的主体，技术则是人类创造的客体。然而AI的复杂性使其在某些场景中表现出“类主体性”，如自主决策、自我学习和复杂推理能力，这种特性引发了对人类技术控制力的担忧。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AI可能被资本操控，成为支配劳动者的工具，削弱人的主体地位。例如TikTok的算法推荐机制通过强化用户偏见，显著提升平台用户粘性，但也加剧了信息茧房效应，削弱了用户的自主判断能力。

AI的军事化应用也进一步凸显了主体性与客体性的矛盾。2022年的一项报告指出，全球已有超30个国家开发自主武器系统，这些系统在缺乏人类监督的情况下，可能因算法错误导致不可挽回的后果。

在社会主义框架下，通过民主化的技术治理和透明的算法设计，AI可被重新定位为服务于人类主体性的工具。《人工智能法案》要求企业公开高风险AI系统的运行逻辑，以增强算法透明度[[5]](#endnote-5)，中国的开源社区通过开放核心算法代码，促进公众对技术的理解与参与。

综上所述，AI技术在马克思主义视角下既是劳动重塑的工具，也是异化与解放的载体。在资本主义框架下，AI可能加剧劳动者的异化与剥削；在社会主义框架下，通过公平的资源分配、透明的技术治理和全面的教育改革，AI可成为解放人类潜能、促进全面发展的工具。

**四、人工智能与人类社会制度之间的深刻关系**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不仅是科技进步的体现，更深层地反映出社会制度与技术之间的深刻互动关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中，技术从来不是中性的，它总是在特定的社会制度、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框架下运行与发展。人工智能作为高度复杂的生产力形式，其发展路径、分配机制及社会效应，在不同制度下呈现出迥然不同的面貌。资本主义制度下，人工智能往往成为资本逐利的工具。在这个体系中，技术的发展以利润最大化为导向，导致技术资源被少数企业垄断，形成以数据控制为核心的新型资本积累逻辑。

相比之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工智能的发展目标更倾向于公共利益和人的全面发展。社会主义强调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和发展成果的全民共享，这为人工智能的社会化发展提供了制度基础。在这一制度框架中，人工智能不再是控制人的力量，而是服务于人民群众福祉的工具。政府可以通过立法、政策引导和资源配置，推动人工智能在医疗、教育、养老、环境治理等公共领域的广泛应用，从而提升社会整体福利水平。同时，社会主义制度更强调劳动者的主体性和参与权，通过民主化的技术治理机制，如公众参与的算法审查、开放的数据共享平台，以及对企业的监管制度，防止技术发展被少数人所垄断。此外，国家层面可以通过教育制度改革普及人工智能相关知识，提升全民的技术素养，缩小数字鸿沟，使技术成为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财富。

马克思主义强调，制度不仅决定了技术的使用方式，也塑造了人与技术的关系结构。人工智能的未来不是技术自身决定的，而是在社会制度中被形塑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技术异化的风险日益突出；而在社会主义的制度保障下，人工智能有潜力成为促进社会公平、实现人的解放的重要力量。因此，我们应当超越技术自身的逻辑，深刻把握技术背后的社会制度结构，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视角，推动构建以人为中心、以共同发展为目标的人工智能发展模式。

**五、人工智能时代下人与技术关系的未来展望**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为人类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伴随着深刻的挑战。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我们提供了批判性视角，帮助我们理解技术进步的双重性。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人工智能可能加剧社会不平等和异化现象；在社会主义框架下，人工智能则有可能成为推动人类解放的重要力量。

从长远来看，人工智能技术的未来方向取决于社会制度的选择。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进步往往服务于资本增殖，导致劳动者的异化和不平等的加剧；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和技术治理，人工智能可以成为解放人类、促进全面发展的工具。例如，通过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公共服务领域，可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社会福祉的提升；通过民主化的技术决策，可以确保技术发展符合社会整体利益。

人工智能时代的人与技术关系还需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协调。随着技术全球化的加深，各国应在技术标准、数据隐私和伦理规范上达成共识，以防止技术军备竞赛和伦理标准的碎片化。未来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人工智能治理的共识，推动技术进步服务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六、结论**

人工智能时代下的人与技术关系，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最新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视角，揭示了人工智能技术的解放潜力与异化风险。人工智能作为一种高级生产力，既可以成为解放人类的工具，也可能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加剧异化现象。

为确保人工智能技术服务于人类的全面发展，我们需要在制度、技术治理和教育文化等多个层面进行综合改革。在社会主义的框架下，通过社会化分配、民主化治理和公众参与，人工智能可以被引导为促进人类自由与幸福的工具。未来我们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探索，确保技术进步与人类解放的最终目标相一致，为构建一个更加公平、自由和全面发展的社会奠定基础。

1. 德 马克思,德 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M].人民出版社,2003. [↑](#endnote-ref-1)
2. Ekkehardt Ernst,Rossana Merola,Daniel Samaan.人工智能经济学：对劳动世界的未来产生的影响[J].中国劳动,2019,(11):60-88. [↑](#endnote-ref-2)
3. 邱子童,吴清军,杨伟国.人工智能背景下劳动者技能需求的转型:从去技能化到再技能化[J].电子政务,2019,(06):23-30. [↑](#endnote-ref-3)
4. 马克思.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M].人民出版社,1979. [↑](#endnote-ref-4)
5. 东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的治理：欧盟立法与“中国路径”——基于欧盟《人工智能法》的分析与解读[J].图书馆,1-7. [↑](#endnote-ref-5)